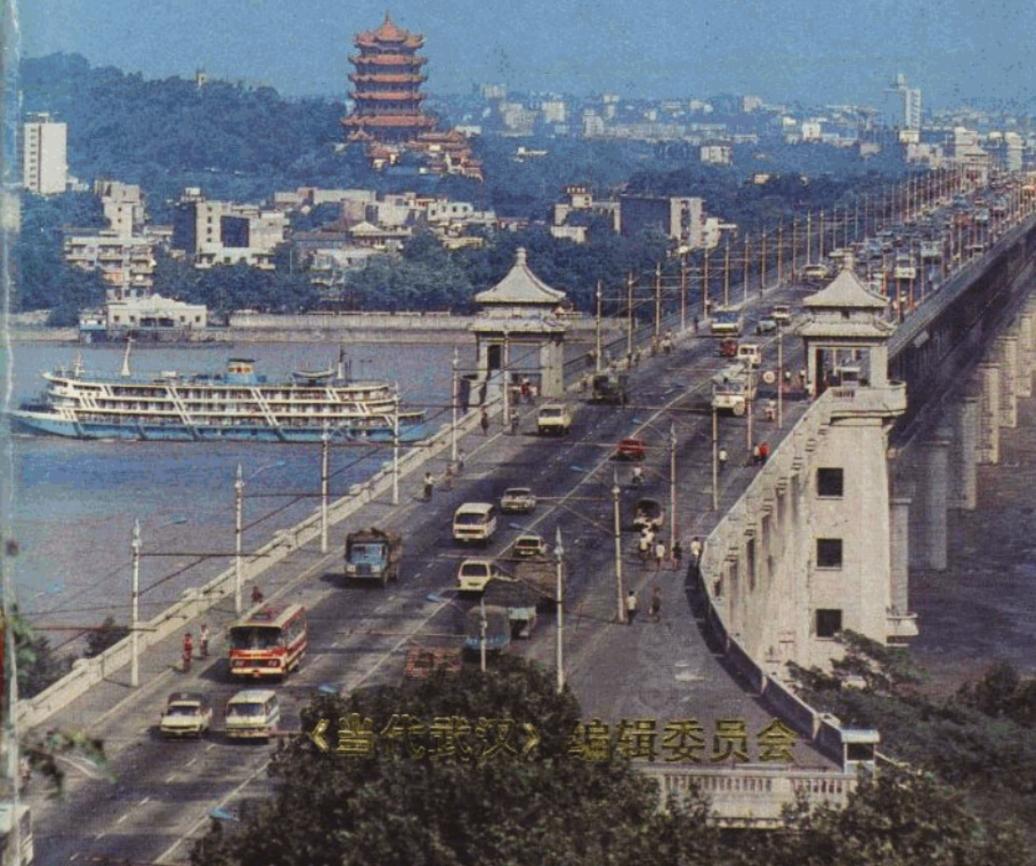


當代武漢

CONTEMPORARY WUHAN



《當代武漢》編輯委員會

序 言

郑 云 飞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和武汉解放 40 周年的时候，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民政府组织撰写的《当代武汉》一书出版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当代武汉》这部书，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城建、科教文卫以及政治建设等方面，对武汉解放后 40 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也记录了武汉市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意气风发，艰苦创业的光辉业绩。此书的出版，对国内外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武汉，推动武汉市今后的改革和建设，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也是我国内地的特大城市之一，在全国经济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她的兴盛，不仅直接关系到湖北省“中部崛起”战略和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而且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武汉市经过 40 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方针以来，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生动的事实充分显示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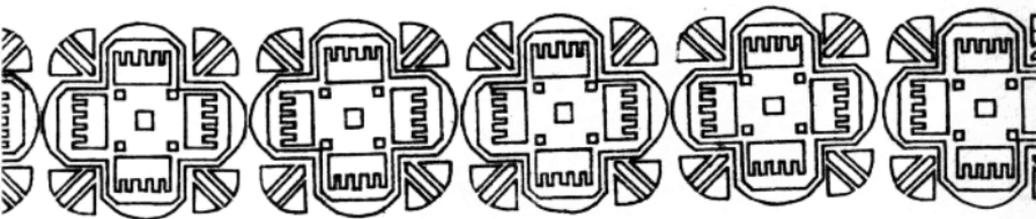
过去的40年，我们既有成功的喜悦，也经历了失误的坎坷，是一段极不平凡的历史。《当代武汉》对武汉市40年历史经验教训所作的初步探讨，对于我们总结过去，进一步搞好武汉市今后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正确认识武汉市的市情，把中央的大政方针与本地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两手抓，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全市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只要我们牢记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在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认真落实“改革兴市，科教立市，依法治市，勤俭建市”的基本市策，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把武汉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昌盛、风尚良好、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当代武汉，生机勃勃；展望未来，任重道远。现在，改革正在深入，经济建设形势逼人，武汉市在全国所处的经济地位正受到严峻的挑战，优胜劣汰，催人奋进。我们要善于把握契机，发挥武汉市600万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1989年5月16日



绪 论



江汉交汇 三镇鼎立

万里长江虎虎奔过辽阔的江汉平原，直下夹江而峙的龟山和蛇山，日夜涛声，莽莽苍苍。盘折千里的汉水，在秀丽的龟山脚下轻轻一拐，缓缓注入浩瀚的长江。就在这二水交汇、湖山叠翠之处，矗立着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部分合组而成的我国特大城市之一——武汉。

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我国中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解放40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武汉已发展成为以冶金、机械、纺织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华中地区的内、外贸易中心，我国东西结合、南北对流的交通枢纽，重要的教育、科研基地，以及开发长江流域经济的重要支点。

武汉市的地理位置为东经 $113^{\circ}41'$ —— $115^{\circ}05'$ ，北纬 $29^{\circ}58'$ —— $31^{\circ}22'$ 。在平面直角坐标上，东西最大横距为134公里，南北最大纵距为155公里，形状酷似一只自西向东翩翩起舞的彩蝶。

武汉市的地形属于残丘性河湖冲积平原。1988年末，全市土地面积8392.76平方公里，占湖北省面积的4.4%。全市辖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7个城区，东西湖和汉南2个郊区，武昌、汉阳、黄陂、新洲4个县。市区地势开阔，湖泊星星点点，以长江和汉水为天然界线，磨山、珞珈山、洪山、蛇山、龟山、凤栖山等30余座小山峦蜿蜒市区，使城市的地面空间显得层次分明，跌宕有致。东湖、南湖、沙湖、紫阳湖、莲花湖、月湖、墨水湖、后湖等数十面湖泊，如同镶嵌其间的一小块块晶莹的碧玉，瑰丽多姿。大好的自然山川，经过武汉人民辛勤的垦殖点染，成为风格独具的自然风貌和城市景观。

武汉市属副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热量丰富，无霜期

长,四季分明。辽阔的郊县河流纵横,沃野千里,是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的富庶之地。

武汉市境东邻黄冈县、鄂州市、大冶县,南接咸宁市、嘉鱼县、洪湖市,西界沔阳县、汉川县、孝感市,北与大悟县、红安县、麻城市接壤。

武汉市居华夏腹地,距京、津、沪、穗、渝、西安等城市均在1200公里左右,居“中”独厚。境内河流交错,湖泊密布,构成了以长江为主干的水运网,得“水”而优。居中得水,内联九省,外通海洋,承东启西,扼南控北,是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之一。

1988年末,全市人口总数641.7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43.5%,非农业人口占56.5%。在总人口中,城区人口337.23万人,郊区人口27.23万人,4县人口277.27万人。全市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65人,其中城区每平方公里3871人,郊区每平方公里370人,4县每平方公里409人。市内居民以汉族为主,还有回、满、壮、土家、蒙古等33个少数民族。

自古以来,武汉就是文化昌盛之地,代复一代的文人在这里写下的璀璨诗篇,宛如夜空的繁星,在今天还闪烁着炫目的光芒。唐代著名诗人崔颢写下的《黄鹤楼》一诗,使大诗人李白在黄鹤楼上面对浩渺的烟波而搁笔长叹,传为千古美谈。后人推崇《黄鹤楼》一诗为唐代七言律诗之首。依傍着龟山的琴台,淡雅空灵,春秋时俞伯牙与钟子期在此结为生死不渝的知音。两千余年来,他们诚挚真挚、纯洁无邪的友谊和清澄的月湖秋波、明净的龟山秀色在琴台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令人心远神驰的飘逸景象,给人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抚慰。

杏花春雨,玉笛梅花。烟笼柳染的江城,在她几千年的岁月中,历经沧桑。在这里,大禹留下了跋涉的传说,屈原被放逐而太息行吟,祢衡揽笔写下了《鹦鹉赋》,李白深情地送别过远去的帆,岳飞在这里饮过他的战马,陆游在这里磨过他的宝剑。落日熔金,

滔滔的江水是流不尽的英雄血；江山如画，茫茫的烟雨添多少赤子报国情。

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武汉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武汉历史悠久，自商周、春秋、战国以来即为重要的古城镇，宋、元、明、清以来就是全国重要名镇之一。武汉还是革命的城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二七罢工、八七会议等都发生在这里。现存的革命遗址、名胜古迹，有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二七罢工旧址、八七会议会址、向警予、施洋烈士墓，及胜象宝塔、洪山宝塔、归元寺、黄鹤楼、东湖风景名胜区等。”

“来者尽翘翘，前峰喜更高。”武汉被确认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于继承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武汉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商代城邑到华中重镇

武汉市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东部，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既有地理变迁的因素，也有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原因。江汉平原的地质基础奠定于白垩纪，经过多次漫长的地质构造运动，江汉平原成为湖群最为密集的地区。在距今12000—4000年的全新世早、中期，长江两岸河湖杂错，江河湖泊之间的陆地上植被茂密，气候温暖湿润。

就在这片神秘的水网之域，远古人类留下了艰辛的足迹。据在武汉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约在距今8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先民们就在这山明水秀的原野上劳动生息，用石制工具，拓现了文明的曙光。

在紧靠武汉市区北郊的今黄陂县盘龙湖畔，发现了一座距今3500年前的商代早期的文化古城——盘龙城。盘龙城不仅是长

江流域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城，而且是我国保存到迄今为止在地面上还能看得见的商代早期的城址。经考古工作者 20 多年的发掘揭示，此城在当时靠山面水，濒临长江，具有良好的交通条件。城外北面有城壕遗迹。城壕之外，分布着大片密集的文化堆积，应是奴隶和平民住地。南面有手工作坊遗迹。城东、城西则多次发现同期墓葬。在城内的东北隅，保存着一大片夯筑台基，为大型宫殿建筑群所在。城址的规模和出土的许多青铜礼器、青铜武器、玉器、硬陶器等等表明，这座具有早期城市特征的城池，在当时不但是一个地域性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而且也是南方与北方的一个经济和文化的交汇中心。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与文化 and 长江流域的经济与文化互相融汇吸收，使这一带远在距今 3500 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如此高度的文明。

武汉三镇的历史沿革，时序错落不齐。或因地理军事的原因或早或晚，或因政治经济的原因或分或合，且历代置属多有不同。

商周以降，南方出现了泱泱大国——楚。当时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于山川之中。春秋时期，楚势迅速崛起，一度问鼎周郊，主霸中原。在频繁的战伐中，楚国相继吞并了汉水中游以东的随、郢、贰、轸诸国，包括今武汉市及其属县在内的江汉平原东部地区，由此纳入了楚国的版图之内。对于新占地域的治理，楚国采用设县的办法，故县制为楚人所首创。而武汉地区因长江、汉水流贯其中，成为楚人自大冶铜绿山输送铜料的必经之地。至战国时期，这里又是楚国郢邑封君的经商船队北上唐河、白河或南入洞庭、湘江的重要水道。

西汉初，对全国政区进行调整。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置江夏郡，郡内设沙羡县，县治涂口（今武昌县金口镇），这是武汉地区第一次建县。自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武汉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地位日益提高，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武汉境内的古城达十座之多。这些古城主要分布在长江流经武汉一段的两岸，以及早

期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高阜上。特别是在风云际会、烽火迭举的东汉末期，相继在今汉阳龟山筑郢月城，在今武昌蛇山筑夏口城，开始了武汉市区的开发。但此后直至南朝时期，武汉还只是在军事上发挥它的优势。

隋再次完成南北统一后，按“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县治在今武昌区），同时改郢州为鄂州，州治也设在江夏。江夏之名一直沿用到清代。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县治在今汉阳区），汉阳之名，由此沿用至今。随着国家统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汉水入江口作为军事要地的意义减退。而南方经济的稳定增长，逐渐推动经济重心的南移，于是，新的经济发展局面将武汉的形势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江夏城再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城堡了，人口一增再增，城围一扩再扩，“百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上承荆益、北通秦梁、南接湘桂、下达吴越的武汉，成为长江中游沟通南北的要地，南方商品的交汇中心。武汉的地理条件在商品流通方面开始显示出独特的优势。

唐代中期，以江夏为治所的鄂州，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进步，开始向跨地区政治、经济中心走出了最初的一步。作为水陆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资集散地，不仅商贾辐辏，百货汇集，就是国家从东南各地调往北方的盐铁租赋，也均用船只从武汉溯汉水转运北上。当时武汉江面上为转运奔波的船只往来如织，号为东南巨镇，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日趋重要。两宋时期，由于长江主泓在此左移，鹦鹉洲及夏洲、武洲先后在蛇山南北两侧并岸，使武汉政区逐渐扩大，户口骤增，成为市邑雄富、列肆繁错的一大都会。北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宋太祖“置三榷署于建安、汉阳、蕲口”，武汉以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导致了地方政府机构的升格。唐宋以后武汉的发展与昔日城市由军事据点而发展起来的情况不同，与中国一般的封建城市发展规律也多不相同。当时“贾船客

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而“鄂州茶”更是名闻天下,国家在武汉设置茶叶专卖机构,成为一大财政收入。同时,这里的造船、冶炼、制瓷三业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先进,制作之精湛,亦处于当时国内的领先地位。

元、明两代,今武昌为湖广行省治所,清代是湖北省治所和湖广总督驻地;而由元至清,武汉一直是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和商业都会。明代中叶,在汉阳龟山之南入江的汉水主流淤塞,山北的支流成为汉水入江的主流,这对武汉三镇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地理基础。淤塞起来的汉口得地利之厚,迅速发展起来。一时“泊岸码头应运而起,汉口勃兴,成为湖广漕粮储存、转运的中心。当时“帆樯相属,不分昼夜”,商业及转口贸易日益繁盛。旋即在汉口置行政机构巡检司。明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经济发展的自然内力可以冲破某些昔日社会关系的牢笼。这种力量也给古老的武汉商埠带来了新的活力,附近黄陂、孝感的居人大量迁入汉口,他们利用四方商会带来的信息灵、市场近,因而商品生产成本低、资金周转快等经济优势,使商品生产发达起来。清朝时期的汉口已是“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这已决非旧日虽市井可观而外人居多的景象,不再是单纯的商埠了。武汉商业流通的地理优势正转化为商品生产的地理优势。得江、汉交汇之利的武汉,在清初就成为我国腹地最大的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地和商品生产地。明末清初,汉口镇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为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清代后期,设夏口厅,隶武昌府。

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在西方列强的炮口下,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以后,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先后有18个国家来汉通商,外国兵舰商船直接开进了汉口码头。英、德、俄、法、日等国蹂躏我国主权,相继在汉口辟建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殖民者以武汉为据点,开设洋行、银行,推销洋货,偷运军火和毒品,廉价收购土特产

和农、矿产原料，肆无忌惮地向我国内地进行经济掠夺。1863年，俄商在汉口开办了“顺丰”砖茶厂，这家自行发电、拥有当时最新式蒸汽机及各种制茶机械的砖茶厂，便是武汉第一个近代工厂。从1863年至1911年，列强在武汉开办各类工厂43家。这些工厂利用我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制造商品，就地倾销，牟取暴利。同时，洋货大量倾销，本地手工业商品滞销，土特产原料大量廉价外流，封建经济日趋解体，武汉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逐渐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工商业城市。

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清末的洋务运动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兴办了一批军工及民用的近代工业。其中汉阳炼铁厂不仅是我国近代最大的冶金企业，在远东也是首屈一指的。从1890年至1911年，武汉官办与官商合办的工厂共有17个，占全国同类工厂总数的17%，投资总金额为1300多万两白银。武汉也一跃而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地区。晚清50年中，武汉共兴建各类工厂约100个，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

但是，如同全国各地的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富强一样，张之洞的新政也没有使武汉根本兴盛起来。当时各种洋务企业、事业的主持者均为封建官僚买办，经营管理上充满封建性和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都很低下。许多企事业耗资大，效益差，年年亏损，以至无法维持，只好关闭、停产或移交商办。

武汉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至辛亥革命前夕，民族资本家在武汉创办了各种新式工厂41家，工人总数约8000人，资本总额约1000余万两白银。

辛亥革命前，武汉的商业多集中在汉口，总数约7000余户。营业额较大的有茶行、药材行、粮食行、棉花行、油行、盐行、杂货行、纸行等8大行帮。1904年的贸易额即达1亿两白银，占武汉三镇贸易总额的70%左右，居全国第二位。

随着经济的发展，武汉的金融、近代交通运输、邮电等业务亦

兴盛起来。1863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首开汉申线,之后,英商怡和、太古,日商大阪等十数家轮船公司相继开辟航线。除招商局等少数企业为我国自行经营外,其余大都为外国人所垄断。大阪公司有三只船直接往返于汉口——大阪之间,为汉口港直接远航外洋之始。1906年,纵贯长江以北半个中国的京汉铁路建成通车。这条铁路大动脉的建成,使水路运输与铁路运输在武汉相联结,为缩毂南北的武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同时,也促进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武昌首义时,清军纵火焚烧汉口,一片火海。战火又延及汉阳,市场、工厂遭到严重的破坏。民国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武汉的民族工商业兴盛起来。从30年代初到抗战前夕,武汉经济曾一度复苏,航空运输也开始出现。武汉货物年进出口吞吐量超过2000万吨,年进出口贸易额增达3亿银元,工业产值也达到2亿银元左右。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为武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金融业也相当兴盛,抗战前夕,汉口有英、美、法、日、德、比等外国银行10家,本国银行28家,钱庄27家,银钱兑换店140家,是我国内地的金融中心。素来发达的武汉内外贸易,在当时全国五大商埠中,对外贸易额多年处于第二或第三位。武汉商业的辐射面曾东及江、浙,南至湘、黔及两广,西经川、滇达西藏,西北至陕、甘、宁、青,北接晋、冀、鲁、豫。

抗日战争爆发后,包括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谌家矶造纸厂、申新纱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周恒顺机器厂等重要工厂在内的250余家工厂迁移川、陕、湘等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工厂的内迁,既改变了内地工业落后的面貌,也为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1938年10月25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奸掳烧杀,无恶不作,武汉的工商企业遭到空前的劫掠,繁华的商业区被烧毁殆尽,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忙于内战,通货膨胀,经济瘫痪,贪污腐

败，民不聊生，武汉工商业更加凋敝。为了挽救财政经济危机，搜刮民财，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1948年金元券开始在武汉发行，其间收兑的银元即达520多万元，占全国收兑总数的22%，居全国大城市之首，使武汉民力大伤。当时，钞票如废纸，物资奇缺，物价暴涨，民怨沸腾，以1948年8月与1937年6月相比，武汉物价上涨424万倍。武汉人民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以风卷残云之势，于1949年5月16日驱散了笼罩在武汉城头的乌云，武汉人民迎来了解放的黎明。

纵观武汉解放前的经济发展，在不同的年代里，有着不同程度的起伏。在近代史上，它是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下，艰难曲折发展起来的。但总的趋势是逐步形成了我国内地的经济中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辛亥首义和两次全国政治中心

武汉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伟大人民。从林则徐在武汉查禁鸦片、首发全国禁烟之端，太平军三克武昌、四下汉口，给腐朽的清政府以沉重打击，一直到以汉口为中心的10余万自立军准备武装起事；从武汉人民抵制卖国的铁路借款，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一直到汉口后湖农民反清大风潮。所有这些，充分表现了辛亥革命前武汉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斗争精神。

在国家 and 民族面临深重危机的时候，武汉地区的许多爱国志士，经过千辛万苦，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刘静庵、蒋翊武、孙武、刘公以及血洒武昌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等，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武汉地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一派人物。

这些斗争，一方面展现了武汉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无法使武汉摆

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不可能使国家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响起的激烈枪声引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260多年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但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没有消灭封建主义的基础,没有担当起反对帝国主义的重任,也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完成。

1920年9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在武昌抚院街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其中郑凯卿为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揭开了武汉地区革命斗争史上崭新的一页。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其他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一起,共同完成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建党初期,武汉的党组织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集中力量于工人运动,相继领导了1921年3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举行的罢工,1921年10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举行的罢工,1921年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举行的罢工,并取得了胜利。特别是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推向了顶点。这次罢工受到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人,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武汉领导人民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英勇斗争。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到1926年底，武汉三镇工会组织已发展到200个以上，有组织的工人达20万。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1927年1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从1926年底至192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武汉。至此，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1927年1月，武汉工人及其他群众数十万人，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驱逐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声势浩大的斗争，收回了汉口英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的重大胜利。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写成并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著作热情地支持农民运动，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从理论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奠定了工农联盟的理论基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4月下旬，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由于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政策，拒绝一切正确意见，在反革命进攻面前，自动解除人民武装，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在武汉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下令解散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宁汉合流，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内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使党前进了一大步。

1927年冬至1929年春，是反动军阀胡宗铎、陶钧统治湖北武汉的时期，也是武汉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之一。胡、陶叫嚣对共产党“以杀为治”、“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人”。长江在刀光中呜咽，武汉在血泊中呻吟。著名妇运领袖向警予也不幸被捕，反动军阀害怕人民群众劫狱营救，于1928年5月1日将她秘

密杀害于汉口。在短短的一年半中，胡、陶在武汉市就屠杀了万余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者的鲜血渗透了灾难深重的武汉三镇。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并没有低下革命的头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烈士的这首就义诗气贯长虹，千秋传诵。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又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军政首脑机关和蒋介石等要人都来到这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各抗日群众团体和流亡学生也云集武汉。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下，武汉地区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武汉地区各级党组织在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领导和组织武汉地区人民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团结各阶层人士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积极抗战，以及在准备与发动湖北地区游击战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发展武汉和湖北地区团结抗日局面和坚持抗战起了重大作用。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为敦促国民党积极抗战，在武汉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各界代表和国际友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折冲尊俎，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党领导武汉人民继续坚持艰苦的地下斗争，为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援，直至抗战的胜利。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以曾惇为首的地下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城工部门，坚决地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领导和组织武汉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坚韧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在震惊全国的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屠杀武汉大学师生的“六一”惨案和枪杀硚口被服厂工人的“一一·七”血

案中进行的斗争，就是学生运动史和工人运动史中的光辉篇章。以张难先、李书城等人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反内战、反迫害的宣传斗争中，以及进行统战策反工作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人民解放军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时，为保护城市、迎接解放，地下党领导武汉各界人民进行了有力的配合策应，终于在1949年5月16日使这座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历史名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武汉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革命斗争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江城的解放，开辟了武汉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前景。